

中国文博界参访东北欧六国博物馆史事考论 (1954—1957)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um Sector Visiting to Museums
in the Six Countries of Northeast Europe (1954 - 1957)

史 勇

Shi Yong

(甘肃省文物局, 兰州, 730030)

(Gansu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Lanzhou, 730030)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 在学习苏联博物馆建设发展经验的同时, 中国文博界专家学者借助各种对外文化交流平台, 通过学习考察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瑞典、芬兰等首批与新中国建交的东北欧国家的博物馆事业, 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出谋划策。相关探讨客观上规划了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的博物馆发展思路, 是当代中国博物馆思想史和中欧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东北欧国家 建筑遗产博物馆 革命纪念馆 国际交流

Abstract: In the mid of 1950s,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new Chinese cultural and museum circles, with the help of various 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platforms, by studying the museum undertakings of Poland, Romania, Bulgaria, Czechoslovakia, Sweden, Finland and the first northeast European countries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visit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ctively give advice to New China's museum cau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hinese museum circles at that time, the relevant discussions objectively plotted a development train of thought for the museum cause of New China, which was not exactly equivalent to the Soviet model,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useum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of sino-european cultural exchange.

Key Words: Northeast European countries; museum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international exchange

1949年10月至1951年5月,新中国同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新中国政策的重要一步。首批建交国包括12个欧洲国家,其中社会主义国家有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资本主义国家有瑞典、丹麦、瑞士、芬兰。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这一时期主要与东北欧国家对外交流。

“一五”计划期间,博物馆界的对外交流逐渐活跃,向苏联学习是其主要体现,“‘苏联博物馆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认真地学习苏联,是我们目前重要任务之一”^[1]。一方面,博物馆界代表团访苏络绎不绝且多有考察体会发表;另一方面,博物馆界系统译介苏联博物馆学文献。但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至1957年期间,文博界在向苏联学习的同时,还通过各种对外文化交流平台,赴其他已建交之社会主义国家及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参观考察博物馆事业。虽然传统观点通常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阵营,但具体考察这一特定时间段可以发现,华约组织成立之初被西方视为“纸板城堡”,是赫鲁晓夫欺骗资本主义敌人的伎俩,诸如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证明苏联尚未完全控制华约国家,赫鲁晓夫在1957年底甚至萌生过推动解散北约与华约的想法^[2]。这一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博物馆事业在内的社会文化生活尚能保持一定独立自主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所谓苏联模式;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亦是华约组织观察员,双边交流相对处于“蜜月期”;至于与瑞典、芬兰、瑞士、丹麦等中立国之文化交流,受意识形态影响亦相对较小。这就为新中国博物馆界进一步开阔视野、借鉴经验提供了新的窗口。

本文根据现有史料,以1954年至1957年期间文博界专家学者考察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瑞典、芬兰六国博物馆事业时的心得体会为基础,试析新中国文博界在“以苏为师”的同时,以百花齐放心态学习借鉴欧洲国家博物馆领域有益经验的心路历程,以期为中国博物馆思想史

和中欧文化交流史的深化研究提供新视角。

一、1954—1957年文博界 参访东北欧六国博物馆概况

文博界赴东北欧六国学习考察博物馆事业的时间要早于官方组织的赴苏联学习考察活动。目前已知的首个官方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由中央文化部组建。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文化部邀请,该代表团于1955年7月26日至9月13日访苏,旨在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博事业方针、政策、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及不同类型博物馆业务内容与管理方法等^[3]。而在此一年前,博物馆专家即已远赴保加利亚等国家参访。

文博界学习考察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主要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配合新中国文化外交,文博专家学者作为中国文物外展代表团成员,赴展览举办国学习考察博物馆事业。如1954年9月至12月,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保加利亚举办,时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的杨伯达作为代表团成员赴保加利亚工作,其间参观访问了该国25座博物馆^[4]。又如根据中波文化合作协定,195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波兰华沙开幕;同年2月,根据中捷文化合作协定,该展览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开幕,后移展至该国俄斯特拉发市。展品包括敦煌壁画临本73件、照片27幅^[5]。敦煌学家、艺术家潘絜兹作为代表团成员出访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参观考察了近150个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包括华沙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密茨凯维支纪念馆,克拉科夫的马特义科纪念馆、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博物馆,波罗宁的列宁纪念馆和布拉格的捷克国家美术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哥特瓦尔德博物馆等^[6]。

二是文博专家学者作为嘉宾,应邀出席相关国家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其间学习考察展览举办国博物馆事业。1956年9月26日,芬兰拉哈底城艺术博物馆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展品系芬兰现代版画家杜赫格1955年访华时的搜集品及中国友人赠送之

纪念品,主要有战国和汉代瓦当、汉画像石拓本、空心花砖拓本、荣宝斋版画、清代刻花铜炉、端砚及近代雕漆瓶、竹雕花插等工艺品,共百余件。同月,在赫尔辛基亦举办了同名中国文物展览,展品包括部分瑞典国家博物馆馆藏中国文物。画家李文信和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应邀赴瑞典和芬兰两国出席展览开幕式,并于9月至10月期间参观访问了19座博物馆(瑞典9座、芬兰10座)^[7-9]。

三是文博专家学者接受国家下达的专项出访任务,赴相关国家专门学习考察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工作。如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王一平等人接受参观访问罗马尼亚和波兰两国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工作的任务,于1957年10月26日至12月26日赴上述两国学习考察,其间参观访问了36座博物馆,考察了部分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及油画修复工作,还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人员进行了多次座谈^[10]。又如历史学家武伯纶、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根据中捷文化合作协定,于1957年9月至12月赴捷克斯洛伐克围绕文物博物馆工作进行为期八周的访问。其间参观考察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画廊)共36座,并与该国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博物馆局及捷克斯洛伐克博物馆科学研究所、博物馆协会举行了座谈^[11]。

四是派往相关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学习期间,作为研学内容之一,参观考察所在国博物馆事业。如当时正在华沙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刘祖熙(1960年获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是中国东欧史研究领域资深专家)等人,利用1957年春假,赴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纺织工业中心罗兹市的考古人文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学习考察,并与博物馆负责人座谈交流^[12]。

当时文博界学习考察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的成因和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其共性是学习考察时间较长。除留学生外,相关专家学者出访时间动辄以月计算,因而参访博物馆数量与类型较多(仅前文列举者即达130余座),交流座谈较为深入,对于相关国家博物馆事业的了解亦较为深刻。这也为专家学者对于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获得相对扎实的感

性认识打下了基础。

二、学习考察获得的感性认识

考诸史料,除了较为详细地了解和向国内介绍出访国博物馆事业管理体制、机构队伍及参访博物馆概况等出访报告“规定动作”外,文博学者着重从专业角度获取了若干具有借鉴价值的感性认识。

(一) 博物馆建设方面

中国文博学者在学习考察东北欧国家博物馆事业时,对于开放式的露天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印象深刻。瑞典斯德哥尔摩斯康生露天博物馆是搬迁木质历史建筑进行集中保护和展示的建筑遗产博物馆的创始者,全馆共有包括农庄、民宅、手工业作坊、市场、教堂在内的历史建筑物187处,“连带着生活器皿、生产工具等,可以活生生的看出当时农村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面貌”。李文信自述:“我刚走进时以为误入了背街小巷,细看外面都有说明牌,才知道这就是陈列品。”^[7]芬兰土尔库旧城遗存历史街区有完整院落9个、不完整院落7个,大都是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者住宅,保存了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场景。每逢传统节日,还有老工匠亲自演示一百多年前怎样制作釉陶器和木器、织布、印刷版画和书籍等。李文信指出:“这是一个受人喜爱的博物馆,也是一个善于利用特殊条件创建博物馆的典型。”^[9]布加勒斯特乡村博物馆“集中了罗马尼亚各州农村中有代表性的房舍院落,其建筑物和室内外摆设,均按原状移置”,中国专家学者感慨道:“参观博物馆,犹如游览了各州的农村,这确是一种别开生面、引人入胜的办法。”^[1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依托名人故居建立纪念性博物馆蔚然成风。杨伯达在保加利亚参观考察了大量故居博物馆后,对于保加利亚在名人故居特别是革命先烈或领袖故居保护展示方面坚持“修旧如旧”“原状陈列”的原则深表赞同,同时认为:“成立故居博物馆除了以某人、某事的最后结论作为依据以外,

而且还有赖于最熟悉情况的目击人和足够的遗物。假若不具备最后两个条件,要想筹建故居博物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3]他对于季米特洛夫故居博物馆就是在其两个妹妹直接指导帮助下布置起来的感触颇深,强调:“为了这个原故,及早的争取在遗物还没有大量散失的时候,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还活着的时候成立故居博物馆是很有必要的。”^[13]

东欧地区在二战中受难深重,相关的战争遗迹特别是纳粹大屠杀遗址大多在战后被改造为博物馆。王一平、陈建平、潘絮兹等人在波兰先后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博物馆,认为:“象奥斯维新那样大的集中营,把它照原状保留,并且有计划地组织陈列,给观众以那样深刻的反法西斯的教育作用,也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种形式。”^[10]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博物馆“在当前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情势中,对人们特别有教育意义。每个参观者都在这里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留下一个永远不能泯灭的印象”^[6]。

（二）陈列展览方面

文博界在参访东北欧国家博物馆时,对其陈列展览的细节处理与人文体验有切身体会。瑞典地处北欧高纬度地区,昼短夜长,日光较弱,斯德哥尔摩历史博物馆和北方博物馆的展厅特别是展柜照明力求均匀柔和,强弱有别,凸显展品轮廓,便于参观,李文信认为:“这些细致的灯光处理,对于处于斯堪狄那维亚自然条件下的博物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他们陈列设计上的特点。”^[7]而位于波兰罗兹市的考古与人文博物馆,展厅和展柜内虽然有照明设备但很少使用,采光主要利用自然光线,落地窗内侧钉有白色薄绸布,“这样使光线柔和不强烈刺目,并对文物有保护作用”。中国学者同时对该馆藏利用率较高、陈列展览展品定期调换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认为这是陈列工作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12]潘絮兹参观位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哥特瓦尔德博物馆总统办公室原状陈列并沉浸式体验后指出:“1953年他从

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仪回来所穿的大衣、帽子搭在椅上,桌上有眼镜、文件夹、书籍,好像主人刚刚出去,立即便会回来似的,给人以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这种陈列感染力量是非常之大的。”^[6]

（三）社会教育方面

中国文博界学者在学习考察过程中还接触到了东北欧国家博物馆以人为本、面向各层次公众的社会教育方法。李文信在参访体会中专门提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历史博物馆,“馆前大路旁设有广告塔,塔内陈列有几种美丽的陶瓷器模型,塔上安有灯彩文字,昼夜向群众宣传。这一点,是别的博物馆所没有的”^[7]。芬兰土尔库古城教堂有千年历史,教堂二楼辟为博物馆,李文信认为:“能利用这种宗教条件,给群众一些历史、技术和爱护文物的知识,也是个较好的办法。”^[9]胡继高和刘祖熙则对波兰罗兹市考古与人文博物馆讲解员的综合素质颇为赞许,他们估计该馆讲解员“一般都相当于大学助教的水平”^[12]。

三、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出谋划策

对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之后,文博界专家学者结合参访体会和国内实际,剔除个别不符合中国国情和超出现阶段落实能力的做法,总结归纳了若干条值得学习借鉴的有益经验,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一）应注意精兵简政、提高效率

武伯伦和罗哲文在学习考察中了解到,捷克斯洛伐克马尔金民族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较北京历史博物馆大几倍”,但工作人员仅18人。该国一般博物馆人员编制均在10人左右,而许多纪念馆仅有一个管理员和一个服务员。该国博物馆领导都参加布展等实际工作,有的博物馆研究人员兼职讲解员,会计兼职售票员。他们认为:“这种干部不分大小、深入实际的工作态度和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1]李文信亦指出:“芬兰国家博物馆考古工作负责人

兼任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学工作者又兼负指导博物馆民族文化工作的责任。这种灵活办法，在专业人员少的国家是很合适的。”^[8]

（二）以博物馆形式推动中国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李文信对于瑞典和芬兰等国依托旧城历史街区创设的露天博物馆、依托古堡等古建筑创设的再生型历史博物馆赞许有加，同时痛感“现在我国农村不断发生破坏古墓葬和遗址事件，通都大邑也有拆除古代建筑和毁灭文物的新闻”。他认为新中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亟待加强，而通过设立博物馆促进建筑遗产有效保护与活化利用不失为良策^[9]。二战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变其社会基础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庄园及宫殿建筑群的功能，一般这些宫殿及庄园建筑都成了博物馆等群众教育或娱乐设施^[14]。以保加利亚为例，普罗夫迪夫州革命运动博物馆馆址前身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俱乐部，全国各地将许多带有土耳其弹痕、刀印和血迹的建筑改为纪念反土耳其侵略的博物馆，一般的人文学博物馆也都设在民族形式的古代建筑里面。杨伯达认为，这样使得陈列内容与建筑的历史、形式得到了呼应和联系，结合成一体。“这种利用建筑本身的纪念意义加强博物馆陈列的思想性和教育作用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4]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纪念馆，是20世纪50年代因公出访的中国人必到之“圣地”和“打卡地”，如位于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列宁博物馆及附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旧址，被国人视为“一定会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场所^[15]。杨伯达强调，中华民族“有反抗国内外敌人的光荣的斗争历史。中国人民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许多优秀的人物为了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国博物馆领导机关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在各地有计划地筹建一些故居博物馆，不但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纪念先烈的愿望，同时也可以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我们应该学习保加利亚故居博物馆的工作经

验来改进和提高我国故居博物馆的工作，有计划地为筹建故居博物馆创造条件以迎接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壮大与发展”^[13]。

（三）陈列展览应注重科学性和专业性

李文信指出，瑞典和芬兰两国博物馆的文物展品具有较强的时代系统性、地域完备性和科学性，“可以充分看出，他们的陈列展出是在有计划的考古发掘、资料搜集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有计划的发掘搜集研究工作，值得我们注意”^[9]。保加利亚博物馆主管机关负责人苏克曼捷娃在与杨伯达座谈时指出，当前某些保加利亚博物馆的陈列中存在着展览会偏向，不像博物馆而像展览会，产生这种缺点的关键在于相关博物馆没有陈列展览设计方面的专业人员，对于博物馆而言，应该使观众看到富有吸引力的实物资料，用实物本身来说明问题。杨伯达认为：“这些意见虽然不够完整，但却是很宝贵的，对我们博物馆工作来说是很好的启发意义的。”^[4]

（四）应注重外国文物艺术品征藏和藏品国际交流

李文信指出，瑞典和芬兰博物馆中多有外国文物艺术品的搜集和陈列，瑞典人类学、远东、埃及三个博物馆甚至是专门搜集陈列外国物品的，因此想到“我们若为了不孤立的进行中国历史研究，给大、中学校师生外国史教学上的参考，备艺术家、建筑师的创作观摩，把我国历史科学研究领域扩大，就有必要早日考虑成立搜集陈列外国文物艺术品的博物馆，或在有条件 and 必要的博物馆中，建立外国文物艺术的搜集陈列部门”^[9]。王一平和陈建平亦提及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注意收藏和陈列世界各国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物，尤其几个大型的国家博物馆，大都专设各国艺术部门，有的还专设东方艺术部，有的正准备专设中国部，因此认为：“这对各国文化艺术交流和增进友谊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也应采取措施，加强这一工作。”^[10]他们还结合参访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相

关博物馆的亲身体验,指出两国相关博物馆收藏和陈列的中国文物,既有确实来自中国的,也有将日本或其他国家的文物误作中国的。“确属中国的东西,也大多质量低、数量少,甚至不少是伪造的;既不能代表中国的历史传统,更不能表现现代中国的艺术成就。参观当中曾有不少博物馆的负责人要求和我们交换展品,盛情可感。我们考虑从国际宣传、文化交流着眼,使人们更正确的、更多的了解中国,我们亟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10]

(五) 社会教育应面向不同层面公众

王一平和陈建平在与罗马尼亚博物馆界交流及实地参观时,了解到有的罗马尼亚博物馆遇到观众咨询但现场暂时无法解答的情况,“则约定若干日内,将经研究后的答案置于陈列品旁,请询问者到时自行来阅览,我们以为这些办法是值得参考的”^[10]。他们同时指出,华沙历史博物馆“经常与中等学校的历史教师举行座谈,及时了解历史教学上的需要,博物馆为他们(学生)开辟专题陈列室,以辅助学校的历史教学”。此类做法“虽属一般,但他们大都踏实的作到,并得有好的效果,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0]。胡继高和刘祖熙有感于波兰罗兹市考古与人文博物馆利用邮电局橱窗布置文物模型和宣传画,认为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6]。

(六) 应加强馆藏文物科技保护

王一平和陈建平参观考察了波兰华沙、克拉克夫、格但斯克等地博物馆附设之文物修复机构,“大多技术精巧,设备完善,对油画、雕塑、织物、玻璃画、陶瓷、铜器等均能妥善修复和保护”。他们在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的修复工厂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不单配备有很高技术水平的修理人员,而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如各种光学设备、化学实验设备等等,解决了许多十分困难的问题,这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10]同时认为,新中国不仅应派专人赴波兰和罗马尼亚学习,还应约请两国专家来中国讲授,“一些必需的科学技术设备,也应当择要逐步添

置,以适应我国文物修复工作的需要”^[10]。

(七) 应及时抢救保护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

王一平和陈建平指出,“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艺术创造,能够在博物馆中得到反映,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是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博物馆的特点,也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大力倡导,并采取有效措施,我们也来作好这一方面的工作”^[10]。杨伯达在参访索菲亚人文博物馆后,对于保加利亚高度重视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抢救保护与展示弘扬,并在博物馆内设工业和手工业企业联络处,推动相关企业将民间艺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做法感触颇深。认为目前中国正在集中人力和物力进行重工业建设,还不能大规模开展人文学研究和搜集工作,但是保加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件工作不允许开展得太迟。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罗曼斯基告诉杨伯达:“现在博物馆所陈列的展品,都是最近几年内搜集的……如果不抓紧时间搜集,再过二十年之后,这些东西就会完全绝迹的。因为机器会很迅速的无情的消灭了手工艺品。”^[16]杨伯达认为:“我们不应该惋惜手工艺品被机器工业所代替的命运,这是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情况。正因为这样,从保存‘国家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历史的实物资料’与向人民群众展示国内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变化以及从在现代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广泛利用民间艺术传统’出发,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开展这个工作,以免给今后作这工作造成困难和损失。”^[16]他强调,虽然目前手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还占有相当比重,不会马上全部地被机器工业所代替,但机器生产的廉价日用品代替农民自己纺织花布、印染、编织、刺绣等技艺性劳动,某些工艺品开始绝灭和逐渐被淘汰的可能性与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开始有重点的搜集和研究曾经对人民生活有过积极作用的手工艺品、农民创造的工艺品和少数民族的工艺品,以便积累材料和经验,为成立人文博物馆和研究人文学打下

基础。当前我国建立人文博物馆的条件可能还不具备,或者还可以暂缓一下。但是为了积累经验,我想指定一、两个力量较强的地方博物馆开始试验,进行有重点搜集并组织陈列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各地志博物馆有必要普遍进行这一工作”^[16]。

四、余论

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有着鲜明的特点和优势。1840年,科学考古学的基础在北欧的丹麦和瑞典奠定,“当时只有这两个国家对古物的兴趣转变成系统的研究,并试图从古物中提炼出史前时代的某些史实”^[17]。因而瑞典等国具有深厚的考古学传统和博物馆文化。按人口比例计算,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世界上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国家,全国1200万人拥有400余座博物馆^[11]。保加利亚则以名人故居博物馆众多著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有此类博物馆35座,占全国博物馆总量三分之一以上^[13]。中国文博界专家学者对于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的学习考察,既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亦可认为具有相当的问题导向与针对性。

本文简要回顾归纳了1954年至1957年间中国文博界参访东北欧六国博物馆的体会。而在同一时期参访苏联博物馆的体会中,多有这样的记载:苏联博物馆的基本任务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鼓舞人民献身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它显示给人们苏联的富饶和强大,告诉观众苏联各族人民的丰富的历史与优秀的文化,教育人民热爱苏维埃祖国、热爱自己的领袖”^[18]。苏联博物馆的主题侧重于波澜壮阔、逻辑缜密的宏大叙事,“苏联博物馆的科学工作者,在从事设计的时候,就不懈地把博物馆的陈列组织当作一部科学著作来处理,既不单纯的注意他的科学性和条理性,也不认为博物馆只是一些死的展品堆积和罗列,而是把博物馆当作一部伟大的带有强烈的感染力的艺术作品来处理,把它当作一部影片那样来突出其形象及

其故事情节”^[19]。苏联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联络站、宣传站和鼓动站之一,比如在列宁格勒革命博物馆举办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在国立文学博物馆举办高尔基诞辰纪念活动,为著名诗人祝寿,举行诗歌朗诵会等^[20]。反观同一时期的东北欧六国博物馆事业,瑞典和芬兰与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同,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在二战前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其博物馆事业既有文化的传承,也经历了必要的改造和与扬弃。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东北欧六国博物馆,既秉持固有传统,亦将具象表达、微观叙事与民生关切、沉浸体验有机结合。相较于苏联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博物馆,在“高大上”方面虽然有所不足,但胜在细节处理和人文关怀,给予中国文博界深刻印象。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向苏联学习对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其意义毋庸置疑。我们亦可以揣测,前贤们当年希望将苏联博物馆模式与东北欧博物馆的有益经验相结合,既保持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正确,也兼顾大时代里的家国情怀,综合两者之长。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奇诡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新中国与除苏联之外的东北欧国家在博物馆交流方面的窗口期短暂打开后又匆匆关闭。学习借鉴包括北欧中立国家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博物馆工作经验后来遭到批判,被暗指为复辟资产阶级博物馆学的阴谋诡计。随着中苏交恶,中国对北约国家的态度亦发生明显变化,视其为潜在的安全威胁^[21-22]。历史证明,基于国外有益经验的前瞻性、开创性发展对策的引入、消化与落实,往往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博弈过程。只有在适宜的政治、社会氛围中获得相应的经济与科技支撑,他山之石方能真正琢己美玉。尽管如此,开拓者们抓住一切机会和短暂窗口期为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引智献策、谋划发展的崇高理想与敬业精神,仍然值得后辈铭记与重温。

参考文献

- [1] 翦伯赞. 参观苏联博物馆的印象: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博物馆业务学习会的讲词摘录[J]. 文物参考资料, 1953(4).
- [2] 沃伊泰克·马斯特尼. 纸板城堡? : 华沙条约组织秘史[M]//李锐, 金海, 译.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 冷战国际史研究: 第8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65-66.
- [3] 于坚, 任昉. 参加新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追忆: 上[J]. 故宫学刊, 2018(1).
- [4] 杨伯达. 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保加利亚博物馆事业[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8).
- [5] 甘肃省文物局. 甘肃文物事业六十年纪事: 1949—2009[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46.
- [6] 潘絮兹. 波捷纪行(二)[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2).
- [7] 李文信. 记瑞典和芬兰的几所博物馆[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2).
- [8] 李文信. 记瑞典和芬兰的几所博物馆(续)[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3).
- [9] 李文信. 记瑞典和芬兰的几所博物馆(续)[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4).
- [10] 王一平, 陈建平. 访问罗、波两国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工作[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6).
- [11] 武伯纶, 罗哲文. 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7).
- [12] 胡继高, 刘祖熙. 波兰罗兹市的考古人文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6).
- [13] 杨伯达. 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 保加利亚故居博物馆[J]. 文物参考资料, 1956(4).
- [14] 普鲁金. 建筑与历史环境 [M]. 韩林飞,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21.
- [15] 张彬. 布拉格的列宁博物馆[J]. 世界知识, 1956(8).
- [16] 杨伯达. 记“索非亚人文博物馆” [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6).
- [17] 格林·丹尼尔. 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 黄其煦, 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45.
- [18] 杨伯达. 苏联博物馆工作介绍(一)[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4).
- [19] 杨伯达. 苏联博物馆工作介绍(二)[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5).
- [20] 洛苏. 苏联博物馆见闻[J]. 文物参考资料, 1958(6).
- [21] 李锐. 难以实现的合作: 中国与华约组织的关系[J]. 俄罗斯学刊, 2014(4).
- [22] 罗歌. 坚决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从博物馆学基础”一书译本出版所想起的[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8).